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4.05.002

■ 毛泽东研究

胡乔木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认识和反思^①

何云峰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胡乔木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毛泽东有近距离的观察。他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表现,探讨了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并就其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同时,胡乔木也强调,要正确看待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要从大局着眼,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做出评价。胡乔木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认识和反思是全面而又深入的,显示出锐利的思想锋芒,对于正确开展晚年毛泽东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胡乔木;毛泽东晚年错误;表现;原因;教训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4)05-0011-09

Hu Qiaomu's Cognition and Reflection on Mao Zedong's Mistakes in His Later Years

HE Yun-feng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 Hu Qiaomu had worked quite a long time alongside Mao Zedong, of whom he had the chance to make a close observation. He analyzed the mistakes Mao Zedong made in his later years based on facts, talked about the causes of them, and made a thorough summary of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ut of them. At the same time, Hu Qiaomu also stressed that we should take a right view of Mao Zedong's mistakes in his later years, and practically and appropriately made the comment consider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Hu Qiaomu's cognition and reflection on Mao Zedong's mistakes in his later years is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which shows his sharp thinking patterns, and is of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research about Mao Zedong's later years.

Key words: Hu Qiaomu; Mao Zedong's mistakes in his later years; performance; reasons; lessons

胡乔木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毛泽东有近距离的观察。他号称中共中央一支笔,对于中共中央两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因素使得胡乔木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认识和反思要比常人更为深刻。他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认识和反思在《胡乔木文集》第二卷、《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和《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等著作中有比较集中的反映。作者对胡乔木的有关论述作了梳理,希望能够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进一步推动对晚年毛泽东的研究。

① 收稿日期:2013-12-01

作者简介:何云峰(1972-),男,河南孟津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

一 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主要表现

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表现,胡乔木主要归结为4个方面:

第一,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胡乔木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但不能将其扩大化。毛泽东晚年的问题是将阶级斗争扩大化了。“所谓扩大化,就是一部分是有的,一部分是无中生有,数量上扩大了,性质程度上也扩大了。”^{[1]157}

胡乔木指出,毛泽东最初对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情况想得非常简单,认为就是发展生产力,“确实脑子里没有考虑再有什么阶级斗争”^{[1]119}。但从1957年反右开始,他对阶级斗争的看法就变了,认为阶级斗争不是越来越缩小,而是愈来愈扩大。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开端。“从这个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这个怪物(或是叫魔影),就很长时间笼罩着我们的党了。”^{[1]154}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则标志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又一次升级。从此以后,“就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引到党内来,不但引到党内来,而且认为党内的阶级斗争比党外的、比社会上的还重要。”^{[1]155}到了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看法“就公式化了”,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1]121}。到1965年初在《二十三条》中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胡乔木认为,这就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人为地任意地有系统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的阶段^[2]。在胡乔木看来,历史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已经不是简单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而是人为地任意地有系统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在审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时他在一段话旁边写道:“文革不能称为阶级斗争扩大化,因为这种斗争本身是捏造出来的。”^[3]总体来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一个主要方面。

第二,在经济建设方面急于求成,严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

胡乔木指出,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大国,这种愿望是完全正确的。可是要实现这个愿望,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决不能单凭主观愿望去领导经济建设。毛泽东晚年发动“大跃进”,企图以超高速来推进经济发展,就是急于求成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急于求成,反映出毛泽东对客观经济规律的陌生和轻视。他对经济工作不熟悉,在领导经济建设时仍然搬用了领导政治军事斗争的经验,习惯于用政治意志支配经济建设。先是提出“政治统帅经济”,后来又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始终坚持“政治挂帅”,将经济工作高度政治化,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4]263}。1958年以后,革命化或者不断革命成了经济工作的最重要主题。在1963年以后,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以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为中心,这种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4]265}。

第三,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

胡乔木指出,八大以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些想法。1958年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同年在北戴河会议上大讲要实行供给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武昌会议上讲不断革命,批评斯大林不注意过渡。以后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到社会主义时又发了一些带空想色彩的议论。后来又讲修正主义的表现一个是利润挂帅,一个是物质刺激。他认为按劳分配和商品交换是资产阶级法权,企图取消商品、货币和工资这几样东西。当然不是一下子取消,而是逐步限制以至取消。胡乔木说:“毛主席的这种思想虽然没有在正式文件中表达,他感到这个想法得不到多数赞成,但是他的这个思想一直保留着并且在发展。他认为这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种想法同现在有一些同志说中国现在不是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异曲同工。”^{[1]74}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对他的社会主义空想目标的一次大规模试验。虽然试验以失败而告终,但毛泽东并未放弃他的追求。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深层原因仍然是为了实现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胡乔木认为,1966年的五七指示、1974年的理论问题指示、1976年的中央4号文件,可

以说是毛主席发动“文革”多少带有纲领性的东西,是代表他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三个重要文件^{[1]72}。

第四,骄傲自满,个人专断,欣赏个人崇拜。

胡乔木认为,毛泽东在很长时期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工作的,但是他没有把它制度化^{[1]133}。由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胜利,毛泽东在党内、在人民中的威信越来越高,人们把功劳、荣誉愈来愈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毛泽东逐渐滋长了一种个人的骄傲情绪,以致越来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

1958年上半年毛泽东严厉批判反冒进,在党内造成深远的恶劣影响。“从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以后,党内的集体领导就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害,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一种局面,就是毛主席的话谁也不能反对。”^{[1]155}经过1959年庐山会议和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被赋予严重的阶级斗争色彩,党内斗争加剧,党内关系日趋紧张,毛泽东更被看作不容怀疑的政治领袖和思想权威。对他的一系列“左”倾观点和作法,即使有人怀疑,也很难依靠(实际上也没有)一种健全的制度的力量进行有效的抵制和制止。

与此同时,由于毛泽东1958年公开表示对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的欣赏,对他的个人崇拜日益盛行。尤其是林彪上台以后首先在军队范围内搞个人崇拜,提出一系列口号,搞了一套办法。毛泽东则提出“全国人民学解放军”,从而把个人崇拜的影响扩大到全社会^{[1]47}。到“文革”发动时,个人崇拜形成一种狂热。毛泽东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胡乔木沉痛地指出: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党的生活完全陷于变态,国家的生活完全陷于变态。国家的主席失掉了行动的自由。总书记也失掉了行动的自由。国家的宪法、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最基本的原则都没有用了。”^{[1]161}

二 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

对于毛泽东晚年为什么会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胡乔木有十分精辟的分析。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社会主义社会认识不足。

在1950年的中国,社会主义是一个新事物。对社会主义社会认识不足,这是全党同志普遍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同样包括在内。所谓认识不足是指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客观的、充分的、全面的认识,具体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一是把社会主义社会设想得比较短,认为很快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很快就可以战胜世界上的资本主义^{[1]208}。没有看到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最终超过资本主义,首先就要认真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的长处和优势。其二是用理想化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社会,认为“应该一切都是和谐的”,对社会主义社会现实中存在的矛盾、斗争和阴暗面没有精神准备^{[1]154}。胡乔木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存在着某些阶级斗争,而毛主席对这一点没有精神准备^{[1]119}。不只是对阶级斗争没有精神准备,而且对其他各种社会政治矛盾也没精神准备。结果来了这些矛盾时,就都当做阶级斗争来搞,越搞越成了一个系统^{[1]136}。其三是对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和任务缺乏清醒而坚定的认识。中共八大提出主要目标和任务是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但没有多久毛泽东就对这个认识产生了动摇。此后在长时期内盲目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标志着“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4]265}。不幸的是,这里所说“纯洁”的实际含义,是用空想的原则取代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纯洁的程度愈高,就意味着经济愈停滞。

第二,受到中国以农村为基础的长期革命战争的影响。

按照胡乔木的看法,中国以农村为基础的长期革命战争对毛泽东晚年思想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长期的革命战争经历使得革命经验对毛泽东有强大的吸引力,或者更准确地说,还有难以摆脱的禁錮力^{[4]265-266}。这种禁錮力导致毛泽东形成了一种阶级斗争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在建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主题的情况下“却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求沿着过去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4]268}。同样的意思胡乔木多次表述过。他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在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他在革命战争得到胜利以后,还想要继续过去所进行斗争的方法。”^{[1]212}“由于这个惯性,火车在拐弯处不拐弯,继续前进,那就要出轨了。”^{[1]212}

中国以农村为基础的长期革命战争对毛泽东的影响不仅限于此。胡乔木还指出,共产党长期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环境又极为闭塞的广大农村进行武装斗争,导致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大批领导干部在知识结构和视野上存在很大的不足:“对经济工作的很多方面不了解,对文化工作的许多方面不了解,对国际情况也有许多不了解。”^{[1]208}胡乔木认为,这是毛泽东后来走上曲折道路的重要原因。正是这种“不了解”,造成一些不幸的后果。后果之一是,毛泽东和相当一部分党的领导干部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产生了一些不准确的想法,例如用小生产者的眼光和视野去认识社会主义,“幻想社会主义可以不要高度发展生产力”,把平均主义、自给自足等当作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后果之二是,形成了对于知识分子以及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本身的长期的轻视和偏见。在农村革命战争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民的直接贡献确实比知识分子大得多,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被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地主方面。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使毛泽东和党的相当数量的干部形成对于知识分子以及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本身的长期的轻视和偏见^{[4]267}。胡乔木说:“毛主席对知识分子有很大的敌对的心理。”“经过反右派斗争以后,在毛主席头脑里面,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不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改变过。”^{[1]120-121}这种在文化、教育、知识分子等方面长期以来的偏向,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准备,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48}。后果之三是,为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与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和冲突埋下了伏笔。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聚集了各方面的英才。以周恩来、刘少奇等人为代表,有许多同志或长期或短期曾在外国生活过、学习过,或者曾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过,这使得他们得到一些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的同志所得不到的知识和经验。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因为各自的经验、知识有很大不同,所以对于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党内开始发生一些意见分歧。正是这些分歧的逐渐发展,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1]208-209}。

第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存在简单化和教条化倾向。

胡乔木指出:“毛主席特别在后半期,有把马克思主义愈来愈简单化的一种倾向,把一些复杂的问题搞得极端简单,他觉得很得意。”^{[1]123}他这里主要指的是毛泽东晚年“把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都归结为阶级斗争,都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解决”^{[1]92}。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指出: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把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这一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又一次严重地而又极端简单化地提到全党面前”。其中“而又极端简单化地”这几个字,是胡乔木亲笔添加的^[2]。

胡乔木曾经深刻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哪一个根本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是,生产力的发展才是更为根本的东西。问题非常清楚,决不能把阶级斗争看作是比生产力的发展更为根本的动力^{[1]6}。毛泽东晚年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为阶级斗争观点,丢掉了更为根本的生产力观点。他把几乎所有政治斗争都归结为阶级斗争,对几乎所有问题都按照阶级斗争观点去分析和处理,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胡乔木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除了阶级斗争之外,还有非阶级性的斗争,还有其他政治力量的斗争,这些斗争不能说成是阶级斗争。否则“只能把事情搞乱”^{[1]92}。将复杂问题统统简单化为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重要根源。

胡乔木指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除了简单化的倾向,还有误解和教条化的倾向。毛泽东经常引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论断,就是显著的例子。胡乔木指出,马克思所说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并不是真正属于资产阶级性质,而是指劳动者平

等交换劳动的的权利的原则,与资产阶级等价交换商品的权利有某些类似罢了^{[1]146}。这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是不应当取消而应当维护的。而且,按照现在我们关于商品经济的看法,等价交换商品的权利是否只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也还是一个问題。

第四,受到国际共运中消极因素的影响。

胡乔木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消极的东西,对于中国党历史上的发展的影响绝不能小看。”^{[1]122}他认为,列宁建立了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错误^{[1]81}。共产国际的集中制原则可以说是列宁关于共产党建党思想的扩大。列宁的建党思想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是在沙皇恐怖统治下提出来的,到十月革命成功以后,是否还要沿袭下来,不作一种原则的改变,而且还扩大到全世界的共产党之间?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俄国要变成全世界的统治者,虽然列宁主观上并不是这样想的。这个影响是非常深的。按照他们那种搞法,就要导致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上存在着领导民族和被领导民族,两者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是改造者与被改造者的关系。……这就把共产主义运动完全引到绝路,引导到它的反面。这是非常不好的^{[1]82}。虽然共产国际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帮了正忙,但是,恐怕帮的倒忙比帮的正忙要大得多。第三国际一成立,就强调民主集中制,就是国际范围里面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国际范围的集权制加上党内的集权制。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列宁没有能够把在恐怖统治下面党做秘密斗争时的活动原则改变成为公开地跟群众在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1]122}。

胡乔木认为,共产国际和苏联党的那种专制模式、斯大林的那套思想体系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虽然打破了共产国际的专制和教条倾向,但对斯大林的一套体系没有批判,对斯大林建设党、领导国家、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理、方法没有批判^{[1]77}。建国以后,我们党学习苏联,实际上是把斯大林那一套几乎全部照搬过来了。“毛主席在很长的时间认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不说中国的列宁了)。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这对于毛主席的刺激是非常深的。”^{[1]122}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产生像斯大林那样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就很好理解了。所以胡乔木说:“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追本溯源还要追到斯大林。”^{[1]77}

第五,中国经济政治文化落后,封建主义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清理。

胡乔木在解释“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曾经明确指出:“国家本身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落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47}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解释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中国的土壤培育了他,同时也影响和制约了他。

中国经济上的落后主要表现在没有发达的商品经济,没有现代化的社会化大生产。经济的落后使得中国成为农民的汪洋大海。毛泽东出身农家,农民的思想观念对他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胡乔木承认:“毛主席确有一些农民思想。”^{[1]132}虽然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明确批判过民粹思想,但民粹思想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很容易生长发育起来。毛泽东晚年孜孜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并且得到很多干部群众的响应,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中国政治上的落后主要表现在民主的缺乏。中国长时期的封建社会遗留下深厚的专制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在1949年建国后没有集中力量认真清除,反而与国际共运中的专制传统相结合,导致中国共产党内民主的缺乏。这就为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提供了条件^{[1]93}。

中国文化上的落后主要表现在民众科学文化素质低下,对于愚昧专制的文化缺乏鉴别力和抵制力。胡乔木指出:贫困产生某种贫困的文化,其典型的表现是把“一穷二白”当作中国的优点^{[4]267}。大跃进运动中,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大搞所谓“破四旧”等等,也都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却在很长时间内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忱拥护和响应,应当说与中国在文化上的落后有很大关系。

胡乔木指出:中国革命是在一个很落后的国家得到胜利的,尽管胜利很伟大,但各种各样的落后不能不影响党的好多方面的活动,也就影响到向社会主义建设转移的困难。落后国家由阶级斗争为主转到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为主,有许多困难^{[1]58}。这些话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毛泽东晚年为什么未能真正实现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

第六,毛泽东晚年在个人性格和品质等方面有一定缺陷。

胡乔木认为,讨论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不宜强调个人的性格和品质问题。因为讲这些东西不能教育人民,不能教育群众。因此在制定决议时,有许多问题没有讲^{[1]123}。但从研究的角度来说,不能回避毛泽东本人在性格和品质方面的缺陷。他在解释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冲突时曾经明确讲过:“毛主席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比较缺少充分宽容的美德。这是他跟许多同志发生一些不愉快关系的因素。”“毛泽东同志的自尊心过于强烈,很不容易接受哪怕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委婉的批评,含蓄的批评,他觉得这是对他领导地位的挑战,也是对他整个思想路线的挑战。”^{[1]213}他还提到毛泽东在经济上犯了“左”倾错误,与他“不能够容忍更谈不上接受正确的意见”有关。毛泽东是一位具有独特个性的政治领袖,喜欢我行我素,不愿意受约束。1970年12月,他曾经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5]358}胡乔木说,所谓无法无天,就是可以不受任何约束,这是毛主席多次表示的,这就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了唯物主义,离开了社会主义^{[1]93}。

胡乔木还从心理层面对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作了分析。发动“文化大革命”,在胡乔木看来,完全是毛主席的冲动。他那个时候的思想可以说是不正常的,根本说不上是一种理性的思维,逻辑的思维。他当时受了很多的刺激,其中“海瑞罢官”引起来的问题的刺激大概比较大,还有一些别的刺激^{[1]117-118}。胡乔木还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究竟要走到哪里去,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一方面是轻举妄动,一方面是随波逐流。他把原有的秩序打乱了,又没有力量造成一个新秩序。最后实际上是不了了之^[3]。

三 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反思

基于对毛泽东晚年错误表现及原因的分析,胡乔木对毛泽东晚年错误作了全面深入的反思。他认为,我们从中应当得出深刻的教训。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一定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中心任务。

胡乔木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建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主题,发展生产力成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和任务。而毛泽东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地搞政治运动。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严重背离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胡乔木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如果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走下去,这个社会主义简直是不如资本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根本不能安定,生产也不能发展,因为它不断地产生阶级、阶级斗争,而且这种阶级斗争只能够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来解决。这么一种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可想象的社会主义。人类社会要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必然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这把马克思主义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怎么能说是科学的理论呢^{[1]118}?

胡乔木还指出,毛泽东晚年孜孜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很大影响。它代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种思潮。从1960年反修正主义斗争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裂,一方面分裂出很多左派的小党,另一方面产生了一批左派的理论家、思想家。这些各种各样的左派,大部分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拥护者^{[1]51}。他们把平等视为社会主义的最高理想。法国的左派理论家贝特兰就认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不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发展经济上,不能提出要达到什么经济指标。还是要继续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要求人人平等,尽量消灭各种差别。所以他说全世界的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都没有搞社会主义,只有“文化大革命”是搞社会主义。因为其他的党都在搞经济建设^{[1]71}。

胡乔木指出,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从毛泽东的言论中了解

到毛泽东晚年思想与他们的想法相吻合才这样说的。中国人民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最真切地感受到它的荒谬性。惨痛的历史教训提醒人们,决不能被这种虚幻的理想所迷惑,要警惕它背后所隐藏的巨大陷阱。胡乔木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宗教和陷阱^{[6]前言}。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也是很多左派人士的宗教和陷阱。“文化大革命”寄托了毛泽东和一些左翼力量对社会主义理想目标的一种追求,但是,离开了发展生产力,这种追求注定是徒劳的。毛泽东和一些左翼力量却执着地相信“文化大革命”能够实现美好的理想,陷入其中不能自拔,这正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反思毛泽东晚年的悲剧,胡乔木深刻指出:社会主义当然要有理想,但前提是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发展生产力,就离开了革命的目的,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社会主义一定要有高度的经济发展^{[1]103}。如果没有高度发展的经济,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社会主义如果没有物质基础,一切都谈不到^{[1]102}。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一定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中心任务。既不能用阶级斗争来取代、冲击经济建设的主导地位,也不能用对某种社会主义空想目标的盲目追求来代替着重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实际努力。

第二,经济建设一定要遵守客观的经济规律。

胡乔木认为,毛泽东晚年在经济建设方面走了弯路,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主要问题在于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忽视经济效益;第二,认为“用类似战争的手段或革命的手段就可以把经济建设推向前进”^{[1]211},偏爱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进行所谓“大兵团作战”;第三,强调政治挂帅,反对物质刺激;第四,不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而是总觉得生产关系不对,也不是按照生产力的需要去改善生产关系,而是把生产关系搞得乱七八糟,愈搞愈不能发展生产力^{[1]165}。

汲取毛泽东晚年的教训,胡乔木提出,经济建设一定要遵守客观的经济规律。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能片面强调政治挂帅,要重视物质鼓励,把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搞经济建设必须认真学习,努力掌握客观经济规律,一定要真正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他强调说,无论何时,只要存在经济活动,就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只要这样,经济建设一定是会顺利发展的^{[1]17}。

第三,一定要切实推进党和国家生活的民主化,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

胡乔木认为,毛泽东晚年错误之所以能够被接受并且长期持续,重要原因在于民主的缺乏。从领袖自身来看,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充分证明:“过高估计自己的作用,滥用自己的权力和威信,这样就会走向反面。”^{[1]159}在这方面,我们过去被灌输的一些观念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为此胡乔木批评了国际共运中长期流行的一些论调。他说,列宁的《“左”派幼稚病》认为,领袖专政是完全合理的,领袖专政就是群众专政。这种提法是很不好的。但多少年来,讲领袖和政党、阶级的关系,都是引用这段话^{[1]186}。同样,党执政=阶级执政也是很难讲通的,而且党执政也只能解释为党领导政权,不能解释为党直接成为政权即国家机器^{[1]144}。

胡乔木提出,要重视党内民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为此他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设想。对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胡乔木也提出了可贵的意见。他深刻指出,社会主义不能只保障人民的经济权利,还要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他说,要规定一些制度,如选举制度、监督制度等来实现政治民主化。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要从基层建立起。汲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胡乔木指出:要使人民生活在一个民主的习惯里。不要说善讲不行恶讲,恶讲不行就动手,甚至说没有武器了,还可以动拳头这些野蛮的话^{[1]104-105}。

除了民主,胡乔木还讲到法制问题。他指出,民主要用法制来保障。宪法和法律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得依据法律程序不能加以改变,所有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1]104}。胡乔木强调,民主法制建设不能离开党的领导,但党要真正是正确有效的领导,不能搞无法无天的领导。如果党的决定违反宪法、法律,不但是无效的,还要受到追究^{[1]109}。

第四,一定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

胡乔木认为,毛泽东晚年犯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有很大的偏向,把阶级斗争理论教条化,到处滥用。因此,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防止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倾向,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胡乔木认为,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党的指导思想以后,确实面临一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教条化^{[1]79}。因为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同党的集权是互为表里的,因为那是绝对科学,所以你就得绝对服从,这样党内对理论问题就很难讨论了^{[1]131}。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要防止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必须改变党内过分集权的局面,要切实推动党内民主,创造民主讨论问题的制度,形成民主讨论问题的氛围。

胡乔木强调,理论工作者一定要有创新精神。他尖锐地指出:从(延安)整风以后,实际上很少有什么创造性的研究,要研究就要是毛主席说过的,没有说过的,没有人敢研究。实际上以后党的理论水平越来越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越来越低。要使党在理论上来一个复兴,要像毛主席那样,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1]131}。

要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除了要有民主制度和氛围,要有创新精神,还要有虚心学习的态度。胡乔木深刻地指出:任何人过去的正确,并不能保证他将来的正确。过去的正确,可以为你创造今后继续正确的条件,但是,也可以反过来成为一个包袱,骄傲自满,走向反面,结果呢,不是保证你继续正确,而是保证你犯错误。所以,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保证一个人思想永远正确,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保证。人的主观要不断地正确地反映客观,就得要对不断变化的新的客观世界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学习。毛主席在后期或晚年没有这么做,因此他走上错误的道路,尽管他过去正确^{[1]166-167}。不仅要学习,学习还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虚心学习的态度。胡乔木说,毛主席晚年也进行了一些学习,比如说《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样一个产物,可惜这种学习没有坚持到底,还往往过于匆忙地下结论。凡是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些方面,就尽量夸大,而不利于自己观点的东西,就尽量否认,或者贬低^{[1]155}。只有抱着虚怀若谷的态度,积极主动地学习一切有益于我们的人类文明成果,才能在理论上有所创造,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

四 正确看待毛泽东晚年错误

胡乔木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遮掩、不回避,但始终保持了冷静、客观、公正的态度。他指出,一定要正确看待毛泽东晚年错误,要从大局着眼,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做出评价。

第一,毛泽东的错误同功绩相比是第二位的。

胡乔木明确指出:“毛主席的错误同功绩比是第二位的。毛主席的这些错误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但毛主席对整个中国革命的贡献是这样伟大,决不能够动摇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1]96}

胡乔木深情地指出:毛泽东是最伟大的党和国家的缔造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他在领导革命战争中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确实无与伦比的功勋。中国有非常丰富的农民战争历史,但过去一切农民战争都失败了,即使有的成功了,最后也变质了。惟有毛泽东所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得到中国历史上没有前例的广泛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也有很多正确的内容。

胡乔木还指出:在遵义会议后长时间内,毛泽东培养了整个党的领导骨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党的各条战线干部。这些干部、党员直到今天还是我们各个战线上的骨干。他的思想深入到我们的血肉里去了,他的大量教导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毛主席对中国革命最伟大的贡献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1]96-97}。

胡乔木同时指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不全是错误,他还是有一些功劳的:其一,毛主席

基本上维持了解放军。其二,他基本上维持了国务院。其三,基本上还勉强维持了党的统一。其四,他在外交上有错误,但功绩是主要的,如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调整外交政策,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等^{[1]113-114,67}。胡乔木认为,毛泽东虽然在外交方面也有错误,但功绩是主要的^{[1]67}。除此之外,胡乔木还指出,一直到最后,毛主席没有把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解放了一批干部,为打倒“四人帮”创造了条件^{[1]67}。胡乔木的这些思想,后来在他主持起草的历史决议中得到了更充分的阐述。

第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性质与林彪、“四人帮”不同,是好人犯错误,是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胡乔木指出:毛泽东晚年错误性质与林彪、“四人帮”根本不同。林彪、“四人帮”是假革命即反革命的阴谋家,他们只想把一切搞乱,乱得越彻底越利于他们夺权。毛泽东晚年是空想的革命家^{[1]281}。“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毛泽东搞出两个司令部,但是,他也并没有把“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统统开除出去,或者搞死,实在说,他也没有这个想法。毛泽东也并无意把这个党分裂。在这方面,他跟林彪、江青这些人确实是非常不一样的^{[1]114}。

胡乔木反复强调,毛泽东晚年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他的主观愿望是好的,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扫除党和国家的阴暗面。“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但还是好人犯错误,他以为一切坏事都是由于党内修正主义造出来的。因此,只要把修正主义打倒,就会符合理想。”^{[1]59}“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但他确是(至少主要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的。他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基本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但不能因此就说他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146}

第三,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实质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胡乔木反复强调,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实质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晚年错误“不但没有动摇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而且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犯这样那样的错误”^{[1]96}。那么,何谓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胡乔木指出: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最根本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同实际相结合这个原则来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1]100}。它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主要在于没有按照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基本原则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所以,胡乔木得出结论,我们要把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区分开来,在坚决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恶感,可是,我们还是不要把洗小孩的水和小孩一块倒掉。”^{[1]123}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团结全党共同奋斗的伟大旗帜,这个旗帜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

综上所述,胡乔木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认识和反思是比较全面和深入的。他既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又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他的很多评论是有思想深度的,值得毛泽东研究者仔细琢磨。

参考文献:

- [1]《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龚育之.关于十七年——从乔木同志的两篇文章谈起[J].中共党史研究,1995(1):15-21.
- [3]郑惠.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上)[J].中共党史研究,1995(1):35-40.
- [4]胡乔木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6]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责任校对 王小飞)